

# 辛亥，死活都要「革命」

• 陳建華

## 一 小引

辛亥百年，理應紀念一番。算不得大肆張揚，各種學術會議、紀念會、展覽會、文藝表演等活動星羅棋布在各地進行；在書店的暢銷架上，幾本趕着應時的關於辛亥革命的歷史敘事書籍，放在一起斑斕而吸睛。作者非等閒之輩，作品幾乎沒有註解，力圖通俗，但無不訴諸歷史「現場感」，力圖把我們帶回王朝鼎革、共和伊始的百年之前，風雲詭譎、可歌可泣，在當下「革命」之聲不絕於耳的全球化境遇中，別有一番甜酸苦辣在心頭。筆者也心血來潮，放下手頭的研究，重讀晚清史料，或許有感於一個會議上一位長者專家的辛亥革命「三百年」的說法，謂其歷史意義要從它的前後兩個百年才能看得更清楚。筆者的視域沒那麼長遠，這裏想在十九世紀末以來世界革命的背景下談談「革命」話語的內在轉折與報刊的傳播功能，也是舊話新說，不至於擦槍走火，或許能碰撞出些許思想火花來。

圍繞百年辛亥，有兩種歷史觀。一種是偶然論，意謂辛亥革命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清末的新政已經成績不小，如果慈禧或光緒不一起死，人心還不會那麼浮動；如果載灃攝政稍能對漢人作些讓步，局面還不至於那麼糟糕；如果……偶然論後面有些說不清的情愫，講革命有些無奈，因為辛亥革命沒有帶來民主共和，反而導向專制和混亂。這裏面或許還有某種帝國的懷舊，且不說這幾年「中國模式」風靡一時，影影綽綽閃爍着帝國的影子。其實滿漢是一家，至少這些年來電視劇裏，清帝一個個活色生香。如果百年前中國真的實行君主立憲，到今天碰到皇室大婚的話，風光必定壓過英國威廉王子。

另一種是宿命論。既然辛亥革命發生了，必定有歷史的內在邏輯，清朝注定要滅亡。這種說法了無新意，比較安全，但事後諸葛亮也不好做。說實在，與其說革命是自然發生的，倒不如說它更有賴於人為的持續的狂熱。在辛亥前

在辛亥前十年裏，有很多堂皇的歪理、流血的策略、無謂的犧牲。如果要講辛亥前十年，或許更應該探究心理和情緒的層面，革命的狂熱是怎麼造成的？為甚麼能持續不息？這和報刊雜誌的傳播有甚麼關係？

十年裏，有很多堂皇的歪理、流血的策略、無謂的犧牲。過去筆者研究晚清「革命」，做的是語義學的考索，這比較適合最初「革命」話語的跨民族、跨語言的翻譯階段，但如果要講辛亥前十年，這是不夠的。或許更應該探究心理和情緒的層面，革命的狂熱是怎麼造成的？為甚麼能持續不息？這和報刊雜誌的傳播有甚麼關係？

## 二 「革命」話語由奴入主

造就辛亥革命的，無論如何，首推孫中山。雖然「辛亥革命」的名稱是後起的，但武昌首義打的是「革命」旗號。以「革命」為名義的反清運動已進行了十數年，從推翻帝制、實行共和這一點來說，「革命」源頭當仁不讓得追到孫中山那裏。據他自述，早在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逃到日本，見到當地報紙稱他為「革命黨」，從此以「革命黨」自稱。這引起學者懷疑，因為找不到當年稱他為「革命黨」的那張日本報紙。懷疑不無道理，但孫中山也不見得存心製造傳奇。確切的是，次年他在倫敦遭到囚禁，以叛亂的罪名被起訴，成為一則國際新聞，日本外相大隈重信注意到了孫中山，便叫手下派人去找這個「革命黨」頭目。1898年孫中山的*Kidnapped in London*（《倫敦被難記》）一書被譯成日文〈清國革命黨領袖孫逸仙——幽囚錄〉（以下簡稱〈幽囚錄〉），在《九洲日報》上連載，因此孫中山從日本報紙得知「革命黨」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只是他的記憶出現了誤差<sup>①</sup>。

孫中山自稱「革命黨」，現在看來順理成章，然而在當時環境裏，卻非同小可。另據陳少白的回憶，孫跟他說「革命」一詞出自《易經》，即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現在日本人把我們叫做「革命黨」，意思很好，以後我們也用這個名稱。陳聽了吃一驚，因為他覺得，從前人的心理，要做皇帝的才可以稱作「革命」，像他們那樣的行為只能算是「造反」<sup>②</sup>。中國二十四史就是改朝換代的記錄，成功了的新政權可稱「革命」，意謂承天啟運，與民更始，具有開創世俗統治的合法性。此外大大小小的起義反抗不知其數，以失敗告終的屬於「叛亂」、「造反」，所謂「成則為王，敗則為賊」。在孫中山那裏「革命」和「造反」換了個位置，兩千年傳統的「革命」話語則被顛覆，他的反清行動被賦予合法性。這一由奴入主的內在轉折對於二十世紀中國可了不得，從此打翻三綱五常，人人高唱「造反有理」，不管願意不願意，都在「革命」大熔爐裏反抗、鬥爭、廝殺，要說「中國現代性」的話，「革命」是它的天字第一號特徵。

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從「驅逐韃虜」到「三民主義」到「聯俄聯共」，其不斷演變也是革命話語現代化的過程，但傳統仍在，即不曾擺脫用暴力手段推翻舊政權的怪圈。孫中山毫不猶豫接受「革命」，因為認同「湯武革命」的歷史傳統，他年輕時代最崇拜的偶像，在外國是耶穌基督和華盛頓，本國就是湯武這兩位「應天順人」的古代君主。從他自稱「革命黨」的一刻起，絲毫沒有叛逆罪感或奴隸心態，反而確信真理在手，代表道德正義與歷史方向，這確實給他帶來神奇的精神力量。1895年之後一再舉行武裝暴動，屢敗屢興，給人以輕率魯莽的印象，而他似乎更着眼於武裝起義的象徵性，就傳播「革命」這一信念而言是成功的。

在孫中山那裏「革命」和「造反」換了個位置，兩千年傳統的「革命」話語則被顛覆，他的反清行動被賦予合法性。這一由奴入主的內在轉折對於二十世紀中國可了不得。要說「中國現代性」的話，「革命」是它的天字第一號特徵。

對中國人來說，誰奪得「革命」的話語權，誰就獲得了天意民心，即政治權力的合法性。當他的名字與「革命」相連並廣為流傳時，已在意識形態方面佔了上風，而對於清王朝來說，在理論上已危及其統治的合法性；然而，當一般士大夫、改良派甚至清廷官員也在這麼流傳的時候，就顯得不那麼正常了。

孫中山橫空出世自命為「革命」，與他以「先知先覺」自居不無關係，事實上這與其說是他的個人行為，毋寧說正逢世界革命風起雲湧的時代，他的思想由是得以形成。自十九世紀中葉在徐繼畲《瀛環志略》中就有關於華盛頓與合眾國的介紹，更不必說孫中山早年在海外受教育，受風氣鼓蕩，無怪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幾成其口頭禪。遠的不說，十九世紀末國內對孫的輿論已置身於世界革命潮流之中，其間跨國媒體發揮不小的影響。

1897年《時務報》上有麥孟華的〈論中國會匪宜設法安置〉一文，對於反清「會黨」勢力愈益蔓延表示憂慮。有意思的是，在羅列哥老會、小刀會等七八個會黨時，作者把三年前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看作是一種新式會黨。過去的那些會黨是亡命之徒、烏合之眾，只是仇視洋人、謀圖財物與個人名位而已，但興中會「援希臘自立之例，倡美洲合眾之義」，具有某種世界眼光，就不能等閒視之，所謂「今日之會匪，其勢之大，其人之智，更非髮逆所能望其肩背者」，比「髮逆」即洪秀全之流要厲害得多。因此麥孟華向清廷獻策，建議改變鎮壓而取安撫的策略。雖然他未提孫氏，但對於興中會的反應及時而到位，且評價極高：「試問秦漢以來二千餘年，所謂盜賊者，有若是陳義之高，托體之尊，知識之達者乎？其去歐美政變之黨，日本尊攘之徒幾何哉？」<sup>③</sup>簡直要把孫氏與法國革命、美國獨立或日本明治維新的領袖人物相提並論了。

孫中山在倫敦受審，結果被釋放，此事使清廷在國際上丟盡面子。國內如《申報》等雖有報導，但主辦《實學報》的王仁俊直接看外國報紙，從倫敦、香港、日本等地的報紙得到有關孫中山的消息。他發出驚呼：「孫文者，亂臣賊子也。」說他「悍然創議改立民主，一欲將中土開闢自沿海以達衛藏，俾得通商，一欲各省都會設電線，建鐵路，天下同軌，俾無阻隘，甚至謂中國人心攜貳，以本朝非中國血脈」。一面罵孫氏，一面言及他的「設電線，建鐵路」等主張，對於一般夢想富強的中國人來說是富於誘惑的，因此這麼說也等於在義務宣傳。王仁俊代表極端保守勢力，堅決主張「仍以經制之學為斷，必覈乎君為臣綱之實，則民主萬不可設，民權萬不可重，議院萬不可變通，不然者，羅馬結死黨，立私會，法黨叛新君，南美洲民起而爭權，不十年而二十三行省變為盜賊淵藪矣」<sup>④</sup>。這裏把法國與美國的革命，連同「民主」、「民權」都視為洪水猛獸而斥之為叛黨、盜賊。

在1898年初《申報》的〈防內患說〉一文介紹「粵東逆犯孫文」在美洲學醫，回香港行醫，但不安分守己，想種鴉片，又上書與李鴻章，皆不成功，於是糾集黨徒，購買軍火，舉兵謀反。所謂「轉徙飄流，行蹤靡定」，孫中山像個江湖劇盜，帶有神秘與傳奇色彩。文中雖指斥他「狂妄悖逆，罪不容誅」，卻直接稱他為「革命黨」，顯然政治不正確，又說「每在海外創為革命之說」，「一時信從者眾，竟有縉紳士類，附會其言」<sup>⑤</sup>。《申報》是家商報，消息看來也很靈通，這類頭版文章多半出自王韜之類的另類文士的手筆，也說明「革命」的新觀念已進入一般的報紙傳媒，在社會上發生影響。

當孫中山的名字與「革命」相連並廣為流傳時，已在意識形態方面佔了上風，而對於清王朝來說，在理論上已危及其統治的合法性；然而，當一般士大夫、改良派甚至清廷官員也在這麼流傳的時候，就顯得不那麼正常了。

新聞無國界，數月之後在日本《九州日報》刊出的〈幽囚錄〉就引用了《申報》的這段報導。其作者宮崎滔天，原來就是大隈重信叫人派遣去跟蹤打探孫中山的，但與孫接觸後，對孫油然而生敬佩，且全力參與中國革命。在〈幽囚錄〉中宮崎利用〈防內患說〉這篇文章，盡斷章取義、移花接木之能事，把那些咒罵孫文的話都拿掉，保留並發揮了那些傳奇性描寫<sup>⑥</sup>。1902年他寫成《三十三年之夢》一書，即被譯成中文，對於孫中山的形象轉變起了關鍵的作用<sup>⑦</sup>。

### 三 混用「革命」與「改革」

晚清知識份子喜歡讀報，從中了解西學和國際動向。當時的消息來源還只不過是星星點點，但中國人也喜歡私下裏傳播小道消息，因此安德遜(Benedict Anderson)說的現代報紙對於建構國族「想像共同體」的功效<sup>⑧</sup>，還得包括一個讀者共同體。從上面引述麥孟華和王仁俊的文章可知，美國獨立和法國革命的歷史既成普及知識，也形塑了一般士人的政治判斷。這方面日本的「革命」觀念起了橋樑作用。日本歷史上政治動亂也不少，卻從未危及其「萬世一系」的天皇制，因此「湯武革命」不適用。但「革命」產生轉義，也用來指政治上的改革，如「明治維新」也被稱作「明治革命」。

這一點很有趣，也很微妙，筆者的同事呂宗力精於古代讖緯研究，熟悉歷史上「革命」之精義。他說日本人不光把孫中山稱作「革命黨」，也企圖向滿清當局輸入「革命」觀念。筆者聽了不由一愣，此話怎講？他即出示一部珍藏的大隈重信所編纂的《開國五十年史》一書，厚厚一大部，翻開書頁有作者題簽，是送贈清朝大臣的，用意是給他們提供明治維新的經驗。書中有「革命與改革之差」一節：「革命與改革語本異，而日本人恆混同之……。明治之初，將軍奉還政權，新政府改革庶政，有觖望者一時亦嘗用兵，人或誤謂之革命，然決非有革命之實也。」<sup>⑨</sup>因此日本人稱孫中山為「革命黨」，意思也許是含混的，但到了中國就產生「革命之實」，毫不含糊。梁啟超在戊戌變法之後到日本，學日本人「混用「革命」，結果吃了大虧。

正因為「革命」與「改革」交叉混用，在明治時代日本人用「革命」來翻譯英文“revolution”，自然把“The French Revolution”譯為「法國革命」，其中既有湯武式的政權交替，也含有政治改革之意，尤其是在確立「人權」、「民主」等現代價值方面使「革命」含有光榮崇高的意義。日本人對「法國革命」有反對也有贊成的，然而涉及本土國情時，態度一致，贊成的是其所代表現代民主的價值觀，反對的是其暴力流血的手段。當這含意複雜的「革命」重返中國時，其勾起的歷史傳統與記憶卻極其強烈而頑固，結果完全兩樣：不僅造成「革命」與「改良」之間的對立，且圍繞「革命」的話語權動輒兵戎相見，展開了數十年未知鹿死誰手的殊死搏鬥。

約在1890年代「法國革命」經由日本的翻譯進入中國，引起的反應是恐懼與排斥。1897年章太炎在《時務報》上發表〈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之文，論述新出現的「學會」在啟蒙民眾方面的好處而要求朝廷加以保護，但最後

日本人稱孫中山為「革命黨」，意思也許是含混的，但到了中國就產生「革命之實」，毫不含糊。正因為「革命」與「改革」混用，在明治時代日本人用「革命」來翻譯英文“revolution”，自然把“The French Revolution”譯為「法國革命」，其中既有湯武式的政權交替，也含有政治改革之意。

說到「不逞之黨，假稱革命以圖乘釁者，蔓延於泰西矣」。發生在「泰西」的「革命」，法國是首選，而這裏「假稱革命」頗可玩味。按照傳統理解，革命是改朝換代，即「係一國一姓之興亡而已」，現在由「黨」來搞「革命」，不僅是更換國號，更含有從專制轉向「民主」的性質。章氏似乎預見到這種「革命」的巨大威脅，因而驚呼：「民智愈開，轉相仿效。自茲以往，中國四百兆人，將不可端拱而治矣。」他呼籲清廷應該立刻實行改革，即「以革政挽革命」，方可避免滅頂之災<sup>⑩</sup>。這篇文章對於認識早期的章太炎很重要，應當說他在形容「不逞之黨」時，腦中已有孫中山的影子了。那時他與康有為一樣主張改革，也和王仁俊那樣的頑固份子一起反對西學，鼓吹「實學」。其實康和王對「革命」諱莫如深，章膽子大，敢面對「革命」話題，那時在觀念上他已經把「改革」與「革命」對立起來，不久他轉向「革命」的極端，其二元對立的邏輯是一樣的。

十九世紀後半期西方傳教士在傳播西學方面居壟斷地位，在他們的筆下法國革命如地獄般可怕——巴黎暴民大肆捕殺王黨，路易十六 (Louis XVI) 上斷頭台，血流成河，慘不忍睹——被描繪得極其恐怖；而且也不稱之為「革命」，而稱之為「民變」、「作亂」<sup>⑪</sup>。傳教士以仁愛為懷，自然不贊成革命。在英語世界“revolution”也指武力政變，意思與“revolt”即「反叛」含混不清，至十九世紀後期逐漸含有“evolution”即「演進」之意，才獲得正面的意義。這一用法反映在英國史家麥肯齊 (Robert Mackenzie) 所著的《十九世紀史》(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 一書中。該書以歷史進化觀敘述近代歐洲政治的變革與演進，雖然渲染了法國革命的殘酷與恐怖，但肯定了它的自由、民主信念對於人類文明的貢獻<sup>⑫</sup>。

1895年出現該書中文版，名為《泰西新史攬要》，是由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與蔡爾康合譯的，出版後成為改良派的教科書。書中寫到1879年7月14日晚上法皇聽到巴黎市民攻陷了巴士底獄時，他脫口而出：「這是叛亂！」但旁邊的朝臣卻回答：「這是革命！」法皇說“revolt”，朝臣說“revolution”，一詞之差，天壤之別，正反映了“revolution”詞義的變化。如果由日本人來譯這段對白，就會把前者譯成「叛亂」，後者譯成「革命」。但李提摩太和蔡爾康這樣翻譯：法皇說：「吾民竟盡反乎？」侍臣回答：「民叛事小，恐非民叛，直欲為國家整頓，事正大也！」<sup>⑬</sup>譯得囉哩囉嗦，或許他們不知道日本的譯法；他們應該知道「湯武革命」的經典，但或許覺得並不妥當。

事實上在當時流行的英文中，“revolution”被譯成「造反」，孫中山早期在香港時就是這麼理解“revolution”的，這也是為甚麼日本人稱他「革命黨」使他興奮開竅的緣故。1897年孫中山在倫敦遭難之後拜訪李提摩太，李對於孫的反清行為為不以為然，說中國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sup>⑭</sup>。不管有意無意，傳教士迴避或否定「革命」確有其不忍之心在，然而不數年間，當中國知識份子從日本不僅吸取「革命」的思想資源，而且對日本人翻譯的關於西方文明的「新名詞」趨之若鶩時，傳教士數十年辛苦經營的西學啟蒙很快就成為歷史陳迹，可歎也已。

我們也許可以發問，假如中國人早些時候知道日本「革命」和「改革」混用的情況，或者早些知道英國人有過“The Glorious Revolution”，即「光榮革命」的和

假如中國人早些時候知道日本「革命」和「改革」混用的情況，或者早些知道英國人有過「光榮革命」的和平變革的歷史，那麼也許會借鑒日本和英國的經驗，以「革命」的名義來進行和平改革？不過，「革命」取向與甲午國恥帶來的激進態度有關。

平變革的歷史，那麼對於「革命」就不會那麼死心眼？也許會借鑒日本和英國的經驗，以「革命」的名義來進行和平改革？歷史不能瞎猜，有一點難以忽視：「革命」取向與甲午國恥帶來的激進態度有關，中國不一步到位，似乎難以安撫深刻的創傷。特別在庚子之後，革命者無不崇拜法國革命，連梁啟超也傾情歌頌：「結數千年專制之局，開百年來自由之治，其餘波互八十餘年，其影響及數十國土，使千百年後之史家，永以為人類新紀元之一紀念物。嘻！何其偉也！」<sup>⑩</sup>「革命」本身含有推翻舊政權的預設，而法國革命更包含社會與政治的整體的改造。

霍布斯鮑姆 (Eric J. Hobsbawm) 在《革命時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一書中把近代世界史歸結為「雙輪革命」——法國政治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它們「曾經改造，並繼續在改造整個世界」<sup>⑪</sup>。晚清時期知識份子對於世界各種政治體制的認識，在多方討論之後，歸結為君主、君民共主和民主三種類型，君主制指中國或俄國，君民共主指英國或日本，民主則指法國模式。在「變法」聲浪中比較不同模式的優劣成敗時，清王朝自然面臨挑戰，似乎被置於世界革命的風口浪尖之上，當它失去自我拯救的機會時，中國不得不尋求與「雙輪革命」接軌的方式。康梁的戊戌變法的政治目標是所謂「虛君共和」，使君主制轉向英國模式，而對他們更具說服力的是日本模式。在變法的政治操作層面，出現「康黨」與「后黨」的對峙，1900年之後，在海外形成「保皇黨」與「革命黨」，孕育着政黨政治的萌芽。「革命」話語的演變不僅是個理論問題，也取決於黨派政治實踐，某種意義上是「君民共主」與「民主」模式之間的競爭，然而在理論上革命派勝出，則借助於「湯武革命」的內在動力。

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要求光緒皇帝效法日本明治維新，全面改革政治機制。確實，日本通過變法，短短三十年便躋身於世界列強。這使康梁他們嚮往不已。還有，在明治初年，一批下層武士發起「尊王倒幕」運動，出生入死，幫助明治天皇從幕府手中奪回政權，使維新事業順利進行。康梁本來默默無聞，由於光緒的破格提拔，忽然置於王朝政治中心，遂對清帝感恩戴德。在與「后黨」的鬥爭中，他們面對明治初年相似的情景，心頭更激起那種「尊王」的悲壯熱情。那時康有為通過編輯《日本書目志》，已經接觸到「法國革命」、「宗教革命」一類的譯名，對於主張在天皇領導下進行「革命」的吉田松陰推崇備至。這一本日本版本的「革命」似乎在他們心頭顫動——是否也能以「革命」的名義在中國實現一場和平變革？但問題是對於已經變得十分脆弱的清王朝來說，「革命」等於要他們的命，根本提都不能提。

1900年由康梁策劃、唐才常領導的「勤王運動」似乎是一次仿效日本明治志士「覆幕尊王」的機會，卻是又一次歷史的錯覺。一方面光緒帝在禁錮之中，不像權力不可動搖的明治天皇；另一方面唐才常等人本來屬於保皇黨中激進份子，受了反清「革命」的影響，想要推翻滿清專制，建立民主政權。目標很大，結果很慘，犧牲了數十個優秀份子，對保皇黨來說損失巨大。這時梁啟超卻進入他的言論的黃金時段，在《清議報》上正大力鼓吹「革命」，極其煽動，一般認為是因為受了孫中山的感召，的確梁把自己比作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孟德斯鳩 (Charles de Montesquieu)，以傳播法國大革命式的思想精神為己任，

有些研究梁啟超的學者只看到他在日本接受了西學之後而產生的思想轉變，卻忽視了他的思想發展的連續性。實際上他在實踐早已仰慕的明治志士的經驗，用模稜兩可的修辭來宣揚一套和平改革的「革命」理論。這一招收到效果，在海外華僑當中為保皇事業募到不少錢。

但有些研究梁啟超的學者只看到他在日本接受了西學之後而產生的思想轉變，卻忽視了他的思想發展的連續性。實際上他在實踐早已仰慕的明治志士的經驗，用模稜兩可的修辭來宣揚一套和平改革的「革命」理論。這一招收到效果，在海外華僑當中為保皇事業募到不少錢。這樣一來孫中山的情況變得很糟糕，他的地盤幾乎全給康梁收羅了過去。

## 四 人人都要「革命」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國已不國，清廷威信掃地；而勤王運動失敗，保皇黨也失勢，此時天意民心垂意於「革命」，勢在必然，對於陷於低谷的孫中山來說真是時來運轉，更得到真人相助——先是從保皇陣營殺出來的秦力山。造成勤王運動失敗的一個主因是康梁答應的支助款項沒有及時交付，因此延遲了起義的時機，據說那些從海外得到的捐款都給他們吞沒了。秦力山原是東京高等大同學校的學生，日讀福祿特爾(J. F. M. Arouet de Voltaire，又譯伏爾泰)、盧梭的學說，醉心於法國大革命。他是勤王軍頭目之一，死裏逃生跑到新加坡，當面指責康有為，遂脫離保皇黨而轉向孫中山，在孫的資助下創辦《國民報》，打破了保皇派壟斷輿論的局面。秦在1901年發表〈中國滅亡論〉、〈政黨說〉、〈說奴隸〉等文，踔厲風發、立場鮮明，他指出，清廷興亡只是一家一姓的命運，在滿清統治下，漢人早已「亡國」；更嚴峻的是「黃種」人淪為「白種殖民」的奴隸。因此中國的志士豪傑應該結成「公黨」，秉承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理念，團結起來為爭取自由民主而奮鬥<sup>⑧</sup>。

康有為說：「辛丑以來，自由、革命之潮，瀾漫捲拍，幾及於負牀之孫、三尺之童，以為口頭禪矣。」<sup>⑨</sup>這感覺可靠的話，就得聯繫到那一年秦力山的那些文章，不像梁啟超那樣高談理論，更切合中國實際，開啟了革命派的言論導向。在此後兩三年裏，革命報刊風起雲湧，圍繞着「黃帝」、「國民」、「種族競爭」等議題，排斥滿人，喚醒漢人的歷史記憶，眾聲喧嘩地建構了一套以漢族為主體的具現代性質的「國族」意識形態，不折不扣發揮了報紙的建構民族「想像共同體」的功能，在這方面沈松橋論之甚詳<sup>⑩</sup>。

針對保皇派安內攘外——即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已迫在眉睫，更應當不分滿漢立即實行立憲改革，否則自相殘殺只會加速滅亡——的理論，革命派紛紛論證革命的必要性，首先在於否定清廷的合法存在。清廷是專制王朝，僅代表一家一姓的利益，這種政權在世界革命的時代應當被徹底剷除。而且「物競天擇」的鐵律體現為種族之間的優勝劣敗，而從血緣、歷史和文化上都可證明只有「炎黃子孫」才有資格代表「中國」，三百年前漢人就淪為滿人的奴隸，因此其首要任務是驅逐異族，「光復」故土<sup>⑪</sup>。這裏「亡國奴」理論充滿悲憤，在激發仇滿情緒方面起到了極大作用。此時「革命」話語進一步開展，在主奴易位的基礎上，「中國」實即漢族成為推進歷史進化的主體，革命並非歷史上改朝換代的重演，在結束千年帝制的同時，還面臨建設現代國家的任務，因此「政治革命」與「種族革命」必須同時並舉，畢其功於一役。

革命派的「亡國奴」理論在激發仇滿情緒方面起到了極大作用。此時「革命」話語進一步開展，在主奴易位的基礎上，「中國」實即漢族成為推進歷史進化的主體，革命並非歷史上改朝換代的重演，在結束千年帝制的同時，還面臨建設現代國家的任務。

這一套論證言之鑿鑿，但推敲起來有不少問題。既然漢人這麼偉大，怎麼會在歷史上一再受「劣等」種族的奴役？既然聲稱「亡國」，不等於承認清朝也是個國家？更不用說把滿人看作「犬羊賤種」，現在看來屬於種族歧視。但不管怎麼說，推翻滿清這一條是雷打不動的。正如1903年章太炎在回答《新聞報》時說：「夫民族主義，熾盛於二十世紀，逆胡羶虜，非我族內，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sup>②</sup>總而言之，好也罷，壞也罷，滿人是死定了的。由是可見，在二十世紀初「革命」話語經歷了一系列轉折和發展，可說是現代化了，但「以暴易暴」的方式沒變，傳統在頑強地延續着，而且在黨派鬥爭中，「革命」和「改革」之間沒有通融妥協的餘地，「革命」被絕對化，即暴力的絕對性。

這些理論建構為1905年孫中山成立同盟會並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打下了基礎。據王德昭《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一書，此時孫氏脫離了會黨性質而轉向知識份子<sup>③</sup>。其實從一開始在晚清士人眼中，孫氏的知識背景就與一般的「會黨」有別。的確以庚子之亂為契機，繼秦力山之後，章太炎也從保守陣營裏殺了出來。1903年他在《駁康有為書》中說：「公理之未明，則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則以革命去之。」即表明「革命」旨在除舊布新，即實現獨立、民主的普世價值。文中稱光緒皇帝為「載湉小醜」<sup>④</sup>，傳誦一時。

康、章分別是當時今、古文學派巨頭，他們在政治與學問上的較量煞有看頭。另一個要角是章士釗，1903年他把宮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夢》摘要翻譯成中文，對於改變孫中山的公眾形象頗富象徵，使他不再是「會匪」而成為堂堂正正的「革命家」。有趣的是儘管孫氏以「革命」自稱，但正如歷史上須得到儒士的認可一樣，這些知識份子在加盟之時，授其以「革命」的現代加冕儀式，意味着承認孫的黨魁地位，這也是一種集體的「正名」行為，同時也賦予「革命」以「中國」主體。

「革命」的承認也來自其政敵，儘管以否定的方式。保皇派中反對革命的莫如康有為。他的《南海先生辨革命書》和《法國革命史論》，分別發表於1902和1906年的《新民叢報》上，後者導致革命、保皇兩黨大論戰，結果革命派愈張大其勢<sup>⑤</sup>。康有為痛斥「革命」，當然是針對以孫中山為首的反清運動。這裏涉及概念使用的問題：康有為在這麼反「革命」時，實際上已承認孫中山自稱「革命」的正當性。這一點在別人猶可，如章太炎說：「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sup>⑥</sup>作為古文學家，章把「革命」歷史化，使之與傳統的「天命」切割，也蘊涵他的現代「祛魅」立場。但對於相信「天命」的康氏則不然。作為今文學派領袖，他應當清楚知道歷史上該派的職能就是運用「革命」的意識形態為皇權服務，其中「天命」扮演了關鍵角色。難道他忘了孔老夫子凡事先得「正名」的教訓？難道也像章太炎一樣已經站在現代立場上？事實上康有為正屬於後者，或許是不自覺的。他反對「革命」，但在價值取向上有不少地方與革命派可說是殊途同歸，情況更為複雜。

「法國革命」是康有為的一個心結。據他自言在戊戌變法期間曾經向光緒帝進呈過《法國革命史》一書，這已為學者們否定<sup>⑦</sup>。他能否對皇帝直言「革命」是一回事，但他深刻了解法國革命，且在其改革理論中生了根。在戊戌變法之前康

有趣的是儘管孫中山以「革命」自稱，但正如歷史上須得到儒士的認可一樣，這些知識份子在加盟之時，授其以「革命」的現代加冕儀式，意味着承認孫中山的黨魁地位，這也是一種集體的「正名」行為，同時也賦予「革命」以「中國」主體。

有為即出版了《孔子改制考》一書，假託孔子闡發公羊學派的「三統」、「三世」的微言大義，作為變法的理論根據。所謂「三世」即人類社會從「據亂世」進化到「昇平世」，最終到「太平世」的大同境界。專制政體處於「據亂世」，俄國和中國即屬此列；「昇平世」指君民共主的政體，以英國和日本為代表；「太平世」則以法國和美國的民主政體為楷模。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要求光緒帝「以俄國大彼德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要求他一面學習彼德大帝 (Peter the Great)，乾綱獨斷，堅決推行新法，一面以日本明治維新為榜樣，全面改革政治體制，首先要開議院和立憲法，藉此使中國轉變為「君民共主」，即由「據亂世」走向「昇平世」，雖然這不是最理想的，因為還沒有達到「太平世」<sup>②</sup>。

康有為要使光緒帝明白，如果不立即變法，就會像法國革命那樣，王朝覆滅，人頭落地。他的「三世」理論已含歷史進化觀，其中法國革命代表「民主」的最高價值，也構成變法運動的精神動力。從這一點上，康已經背離了公羊家的立場。他小心翼翼避免使用「革命」這一字眼，惟恐觸犯皇帝。在體制內改革，他只能用「變法」、「變政」、「維新」這類口號，然而字裏行間滲透着法國革命乃至湯武革命的暗示與隱喻，實際上已是運用世界革命的強勢話語對年輕的皇帝威脅利誘，迫使清廷改革。另一方面，儘管康已經了解到明治日本對「革命」和「改革」含混的使用，但他的謹慎和清廷的拒斥，都不可能造成「革命」的創造性轉化，從而喪失了加強皇權合法性的精神資源。這對於康的人格與清王朝的命運來說，都具有悲劇性。

回顧百年前「革命」的口舌之戰，心有戚戚焉。自道光、咸豐以來清王朝已走下坡路，以致病入膏肓，經不起世界浪潮的衝擊。當「革命」聲起，名器轉移，大勢漸去，再要改轍，正所謂動輒得咎，回天乏術。再說要退出歷史舞台，即要放棄既得利益，也難。在追求富強中國及理論上接受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方面，其實某種意義上改革派的激進程度不下於革命派，所不同的是不贊成暴力手段（雖然也搞過政變暗殺之類），這一點在今天仍有啟示。的確二十世紀初革命派所建構的現代中國的「革命」話語，為辛亥革命奠定了理論的基石，正因為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敗，這一份精神遺產成為現代中國浪漫激情的源泉與難以擺脫的夢魘，伴隨着暴力、仇恨、愚昧與瘋狂，從「革命尚未成功」到「繼續革命」，「革命」由手段而成為不斷追求的目標，當然那是後話，不說也罷。

康有為小心翼翼避免使用「革命」這一字眼，惟恐觸犯皇帝。在體制內改革，他只能用「變法」、「變政」、「維新」這類口號，然而字裏行間滲透着法國革命乃至湯武革命的暗示與隱喻，實際上已是運用世界革命的強勢話語對年輕的皇帝威脅利誘，迫使清廷改革。

### 註釋

- ① 具體考證參見陳建華：〈孫中山何時自稱「革命黨」？——早期思想地圖「革命」指涉的勘探〉，載國立國父紀念館編：《第七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04），頁13-32。
- ② 陳少白口述，許師慎筆記：《興中會革命史要》（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頁3-4。
- ③ 麥孟華：〈論中國會匪宜設法安置〉，《時務報》，第40冊，1897年10月（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91），頁2701、2705。

- ④ 王仁俊：〈民主駁議二〉，《實學報》，第5冊，1897年9月（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91），頁281。另載蘇輿編：《翼教叢編》（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影印本，1970），頁137。
- ⑤ 〈防內患說〉，《申報》，1898年1月29日，第1版。
- ⑥ 宮崎龍介、小野川秀美編：《宮崎滔天全集》，第一卷（東京：平凡社，1976），頁426。
- ⑦ 宮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夢》出版於1902年，收入《宮崎滔天全集》，第一卷。次年由黃中黃（即章士釗）編譯為《孫逸仙》一書出版，書中第一章部分另名為〈孫逸仙與白浪菴滔天之革命談〉，收入由黃藻編輯的《黃帝魂》一書，也出版於1903年。同年出版的另有金天翻的譯本，名為《三十三年落花夢》，較章譯本為全，也非全本，影響卻不如《孫逸仙》。今有林啟彥翻譯的《三十三年之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 ⑧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⑨ 大隈重信編纂：《開國五十年史》（東京：開國五十年史發行所，1909），頁7。
- ⑩ 章炳麟：〈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時務報》，第19冊，1897年2月，頁1252-58。
- ⑪ 謝衛樓(Devello Z. Sheffield)：《萬國通鑒》，卷四下，葉1b-2a，載張蔭桓編：《西學富強叢書選萃》（台北：廣文書局，1971）。
- ⑫ Robert Mackenzi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 14th ed.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1893).
- ⑬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蔡爾康譯：《泰西新史攬要》，卷一（上海：美華書館，1895），頁11a。
- ⑭ 吳相湘編：《孫逸仙先生傳》，上冊（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2），頁188。
- ⑮ 中國之新民：〈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新民叢報》，第18號（1902年10月），頁52-53。
- ⑯ Eric J.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New York: A Mentor Book, 1964), 17; 19-20.
- ⑰ 秦力山：〈中國滅亡論〉、〈政黨說〉、〈說奴隸〉，參見彭國興、劉晴波編：《秦力山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62-74、28-30、51-56。
- ⑱ 康有為：〈物質救國論〉，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八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63。
- ⑲ 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97年第28期，頁1-77。
- ⑳ 1903年出版的《黃帝魂》一書，收入了秦力山、章太炎、鄒容、章士釗等人鼓吹排滿革命的文章，很有代表性。
- ㉑ 章太炎：〈獄中答新聞報問〉，載《黃帝魂》（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影印本，1979），頁245。
- ㉒ 王德昭：《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2011），頁6-16。
- ㉓㉔ 章太炎：〈駁康有為書〉，載《黃帝魂》，頁221、215；219。
- ㉕ 康有為：〈南海先生辨革命書〉，《新民叢報》，第16號（1902年9月），頁1-11；明夷：〈法國革命史論〉，《新民叢報》，第4年第13號（1906年8月），頁1-26、第4年第15號（1906年9月），頁1-36。關於革命派的理論開展，參見朱泮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民報〉個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 ㉖ 參見孔祥吉編著：《救亡圖存的藍圖：康有為變法奏議輯證》（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 ㉗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1-260。